

近代中國教育思想之演變

蘇 雲 峯

前 言

一、清末的體用之辯

二、民初教育思潮的蓬勃發展

前 言

本文分爲清末及民初二部份。清末部份主要討論傳統教育內涵於西方衝擊下所引起的爭議。重要論點在要不要講西學？講那些西學？講西學後會不會降低中國傳統學問的地位，從而破壞傳統價值等問題。從教育的觀點看，實際上就是學堂課程改革問題，然而當時的學者則多從「體」「用」的形而上學觀點去討論，浪費了三十餘年的時間，才獲得一個「中體西用」的結論，奠定清末新教育的基礎。民國成立以後，政體變更，思想一時解放，關心教育的學者不再奉「中體西用」爲圭臬，而紛紛提出各種主張，真是教育思想上多采多姿的時代。這些思想，有些是相輔相成，可以並行不悖；有些是互相牴觸，且隨時代而推移；有些則可超越時空限制，永爲國人追求之目標。如今日臺灣教育界最關心之職業教育與科學教育，在民初已有熱烈的討論。因此，回顧一下這一段時期的教育思想史，對今後的發展應有所幫助。

一、清末的體用之辯

與其他政治經濟社會一樣，近代中國的教育思想也是西力衝擊的產物。這與日

※ 本文爲作者參加「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近代中國的教育改革」一書的第一章。寫作期間受到國科會之獎助，謹此誌謝。

本的經驗類似，但與西方的經驗截然不同。在西方社會進入工業革命以前，教育家已能因應文藝復興運動，從教會桎梏下將教育解放出來，朝向人文主義（Humanism）發展。及十六世紀以後，科學發達，科學實證主義興起，教育亦漸趨「唯實主義」（Realism）^①，重感覺經驗，倡實物觀察教學，尊重科學知識。十八世紀，個人主義盛行，教育上重視個人人格之發展，尚自由，非干涉。十九世紀，民族主義興起，教育上轉重公民訓練，犧牲小我，效忠國家^②。簡言之，西方教育家既能及時響應社會文化及科技工商發展，領導教育進入創新的境界，也能根據自己的實驗，創造新的教育理論，供本國或他國採用實行。如法國盧梭（Jean Jargues Rousseau, 1712-1778）之「愛彌兒」自然主義（Naturalism）教育試驗，瑞士裴斯泰洛齊（J. H. Pestalozzi, 1746-1827）之工業學校等試驗；德人赫爾巴脫（J. F. Herbart, 1776-1841）之於教材教法試驗，及福祿培爾（F. Froebel, 1782-1852）之於幼稚教育試驗等^③，每人都有自己試驗的園地與發現，為他人探行。

清代的學術，因受政治干涉，由清初的「經世致用」轉向乾嘉時期的「考證學」（即所謂漢學），對古籍之整理研究，雖有巨大之成績，惟未能突破自明代起實行的八股取士制度，這是學術與教育發展的最大障礙。誠如梁啟超所說，「八股和一切學問都不相容，學科而為尤甚！」^④教育既受制於科舉八股與專制政治的淫威，教育學家很難有自己的試驗園地與發明創造。即令是熱心西方文物的康熙帝，本可設立一個專門學校，延聘外國專門教授講授這類學問，然而他沒有這樣作。若非私心作祟，恐也與科舉制度有關。^⑤科舉制度對教育的箝制作用繼續下去，直到一九〇五年被廢除為止。但學術思想方面，因國內外政治情勢的激蕩而發生一些可喜的變化。乾隆嘉慶時代的「考證學」仍舊主宰著嘉道間的學術思潮，但一因考證園地有限，一因政治控制鬆弛，思想漸趨解放，有一些學者如龔自珍、魏源、馮桂芬等上承顧炎武之餘緒，起而提倡「經世致用」之學，對同光間之思想界發生很大影響，^⑥並推動一些教育改革，諸如京師同文館（1862）、上海廣方言館（1863）

① 吳康譯，F. P. Graves,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近代教育史（臺北，商務，民五四，影印），頁四五七～八。

② 吳俊升，教育哲學大綱（臺北，商務，民五一），頁一八。

③ 吳康，同前引書，頁六～四一，一三六～一八九，二二一～二九六。

④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中華，民五一），頁一七。

⑤ 同上書，頁一八。

⑥ 同上書，頁二四～五。

之類。經世學派由內鑠的「通經致用」主張，慢慢地於甲午戰爭以後過渡到外鑠的「中體西用」，成為近代中國的教育思想之主流，直到民國以後，才漸向西方的教育模式蛻變，這便是中國近代教育思想發展的主要軌跡。

清季新教育思想之發生有三個特點：(一)如前所述，係受西方衝擊而起，(二)新的思想多發生於與西人接觸較易之沿海口岸地區，諸如廣東、香港、江蘇、福建、浙江等處。(三)提倡教育改革者多為官紳及商人，卻很少教育專業人員（諸如書院山長、分校、教諭、訓導、塾師等），這是教育人員忙於科舉制度中討生活，長期封閉，不與外界接觸所致。關於近代教育思潮受西力刺激而起一點，已為明顯的歷史事實，此處不擬重述。關於新思潮發生地，不論其人原籍何省，均以在沿海口岸地區為最多。從下列近代著名改革人物之籍貫及其接觸西方知識從而發生改革思想之地點看，可知其概況。

馮桂芬（1809-1874），江蘇吳縣人，進士出身。自一八六〇年起居上海，任敬業書院山長及江蘇巡撫李鴻章的幕僚。他的「校邠廬抗議」一書，就在這數年間完成。^⑦

郭嵩燾（1818-1891），湖南湘陰人，進士出身。二十二歲至二十四歲（1839-1841）遊幕浙江，始「初次接觸洋務」，但認識不深。一八五六年「曾一遊上海，於英人的富強益為震詫。同治初年官蘇松糧道，駐滬十月，與當時另一位究心洋務的馮桂芬輔佐江蘇巡撫李鴻章，促成了廣方言館的設置。」^⑧是郭嵩燾之洋務思想係發生於蘇浙，其後出使英國，言論更加激進。

王韜（1828-1897），蘇州府人，生員出身，長期居上海、香港二地，後留英二年半（1868-1870），居日本半年（1879）。曾辦理報館、書局，並出任過格致書院（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Reading Room）之監院與院長。^⑨其思想係在上述地區經由傳教士與西學書籍而來，殆無疑問。

薛福成（1838-1894），無錫人，副貢出身，曾入曾國藩、李鴻章幕府，後出使英法義比四國（1899-1894），倡西學尤其是工商實業教育，不遺餘力。^⑩

鄭觀應（1842-1924），廣東香山人，早年常居澳門，後赴上海經商，任洋行總

⑦ 呂實強，「馮桂芬」，在王壽南編，中國歷代思想家（臺北，商務，民六七），頁四八八五～七。

⑧ 郭廷以編，郭嵩燾先生年譜（南港，近史所，民六〇）序，頁二～七。

⑨ 呂實強，「王韜」，在中國歷代思想家，頁五一〇一～一三。

⑩ 王爾敏，「薛福成」，在中國歷代思想家，頁五二一六。

經理。其洋務思想著作爲「盛世危言」(1894)，其中有論「學務」一篇。他是純粹由商人出身的改革家。^①

嚴復(1854-1921)，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學堂畢業(1867-1873)，留英(1877-1879)，爲介紹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到中國的先驅人物。^②

康有爲(1858-1927)，廣東南海人，1876年起從朱九江讀書三年，得經世致用思想，後自修西學，並至香港、上海等地遊覽，搜集西學書籍，勤奮攻讀，而具維新思想。^③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康有爲之學生。

張之洞(1837-1909)，直隸南皮人，進士出身，惟二十歲以前，在動亂的貴州渡過，而生經世思想。後於天津，受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的刺激，奮發讀書，入翰林後(1877-1880)，「究心時政」，1881年出任山西巡撫，識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從此漸認識西方，而力倡改革。^④

上列諸人，其仿效西法思想之發生，除張之洞外，多於沿海口岸地區及海外。但張灝依據地理文化環境，分近代中國之改革家爲二類：以湖南人魏源、曾國藩爲主導的「經世致用派」(包括馮桂芬、張之洞、李鴻章、郭嵩燾等人)，與王韜、康有爲、梁啟超爲主的「口岸改革派」(Treat-port intellectual)。認爲各派內部雖有絲微差異，但二派之間則有顯著的不同。前者以「中體西用」爲思想之中堅，在整個清季改革思想譜系裏，居於中間偏右，是自強運動的領袖羣。後者則不能以「中體西用」來涵蓋。如王韜認爲西方也有道。在清季改革思想譜序裏，他們居於中間偏左，而譚嗣同、梁啟超等則居於此譜系之最左端。張灝又說，「口岸改革派」曾入李鴻章、張之洞等自強運動領袖之幕府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然而口岸派與內地廣大士紳(Gentry-literati)之間，在1890年以前很少交流。換言之，「口岸改革派」對內地無重大的影響。直到1890年以後，才經由新式學堂、報章雜誌與學會等媒介，將改革思想傳播到內地。^⑤我對口岸與內地關係一點甚表同意，惟將改

① 孫會文，「鄭觀應」，在中國歷代思想家，頁五二三七～六九。

② 郭正昭，「嚴復」，在同上書，頁五三一三。

③ 蘇雲峰，「康有爲主持下的萬木草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三，下冊，頁四二～三四。

④ 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南港，近史所，民六五年)，頁四～七。

⑤ Chang Hao,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Reform", in Cohen, *Reform in 19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6-9.

革家分爲「內地經世派」與「口岸改革派」二類，不甚明確，事實上也劃分不清楚，如馮桂芬生長於江蘇，而被劃入內地「經世派」，譚嗣同爲湖南人，被列入「口岸派」等，似不妥當。故應不論籍貫，而僅據其發生改革思想之文化地理環境爲已足，本文之所以強調這點，原因在此。

沿海口岸地區易發產生改革思想的原因，不言自明。那就是有機會常與西方文化之前鋒短兵接觸之故。

在前述諸改革家中，無一人以教育爲專業。故其所論教育改革，僅爲彼等政治改革之一部份而已。此一時期之教育思想特點，在 1890 年以前甚少討論學校制度問題，而爭論焦點在要不要學習西方技藝科學？因爲反對的勢力比較強大，於是有所謂「西學源出中國說」、「中體西用」等理論出現。換言之，爭議的重點在課程內容，即應否在「中學」之外增加「西學」，以及應增加那些「西學」才不損害「中學」的軸心地位。對西方學校制度，雖有傳教士介紹，及少數士人贊美，但受阻於科舉制度，無法爲廣大士人所接受。官紳中不乏抨擊科舉阻碍人才之培養者，然而沒有地方督撫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改變現狀的。直到 1905 年，才於張之洞與袁世凱的聯合要求下提前廢除。新的學制始有生根發芽的機會。總之，從文化的觀點看，晚清七十年間，浪費前半期的很多時間討論中西文化之融合可能性及融會方式等問題；此類討論在教育思想上言，實即課程教材問題，直到 1895 年以後，才取得一個「中體西用」式的結論。在清季的最後二十年間，教育制度的討論愈來愈重要，曾有省區的試驗，終於 1904 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然而當官紳討論課程問題時，並沒有注意到受教個體的身心發展問題，因此，在教學方法上，重記誦、因襲與信古，而輕感官、懷疑與獨立思考。對西學之接受，無不有所延誤。學制之建立，多係模仿抄襲而來，沒有堅實的試驗基礎，也無充分的準備。這種準備，必須包括經費、師資、設備與行政支援等各方面。故實行起來，阻碍重重，這便是中國近代教育思想的主要內涵與問題。以下我將詳細介紹此一時期中具有影響力的教育思想，以見其逐漸演變之軌跡。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官紳對西方認識的過程，迂迴曲折，由點及面。在 1840 至 1860 年間，僅見點點星光，散亂而無系統。軍人、官吏所能看到的是西方的船砲火藥技術層面。僅林則徐、魏源稍有遠見，主譯西書、搜集情報與籌劃應對之術，即所謂「翻夷書、刺夷事、籌夷情」也。¹⁶ 1861 至 1894 年間，技藝語文教

¹⁶ 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輯一（南港，近史所，民六一），頁九四〇。

育稍受注意，「西學」一詞經馮桂芬之提倡，受到較多士人的重視。但反對學習西方的勢力仍舊龐大無比。因此出現了各種理論與說詞，諸如「運會論」、「西學源出中國論」、「托古改制論」、與「廣貴因論」等。^{①⑦}這些理論，係從各種不同角度提出中國必須學習西方的理由。他們之間未必有邏輯上的關聯，而且往往一個人同時提出以上各種理論，看來似乎自相矛盾，實際是可以理解的。這便是本書不擬以派別作區分彼等思想的理由，因一個人既同時提出各種理論，且彼此不相關聯，如分入甲派，則不能歸乙派故也。這些理論，於甲午戰爭以後，漸為「中體西用論」所取代。「運會論」說明國勢是變遷而非固定的，強調在個變字。「廣貴因論」同樣強調因勢利導，創造新局。「托古改制論」強調制度上的變革，名雖復古，實則模仿西方。這些都屬觀念上的求變。在教育方面，當以「西學源出中國論」為此期之代表，有加以詳細介紹的必要。

所謂「西學源出中國」，指西方一切進步的學問，皆由中國流傳過去的，經二千餘年研究發展，而有今日成就。中國因承平太久，書生不問時務，仕者守成法而未加研究，以致落後於西方，今雖學西方，實則是學自己的，不但不應感到羞恥，而且應感到光榮。

提出這種理論的主要理由是：(一)知識界已完全滿足於自己所追求的領域——漢學與八股文，傾向文化思想上的保守主義，而不輕易接受外來的新事物與新觀念，故必須說西學原為中國所有，才易為士人接受。(二)創此說者固熟習，且熱愛中國之舊文化，但對西學，多聞知皮毛，一知半解，於是牽強附會，或虛構故事，廣徵博引，謂西學源出中國。(三)希望滿足保守士人之文化自大心理，安定人心，避免猜嫌與疑懼以便排除或減少引進西學的障礙。誠如張自牧所說，「然名之為西學，則儒者動以非類為羞，知其本出於中國之學，則儒者當以不知為恥，是在乎正其名而已。」^{①⑧}

此說之引證方式非常簡單，多由中西名詞表面字義之類似處互相比附而得之。其格式不外如下：

- (1) (西學) ××，古所載(謂、云)……，此××之出於我也。
- (2) (西學) ××，始於(古籍) ×××。
- (3) (古籍或某子) 云，……。此×(西)學之祖也。

^{①⑦}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六五)，頁七二~八〇。本文參考此書之處很多，謹此致謝。

^{①⑧} 同上書，頁七五。

下面是此說之實例：

西	學	源 出 中 國 之 經 籍 或 諸 子
星象學(天文曆算)		始於臯區(人名)。
幾何(勾股)		始於隸首(係黃帝之臣,始作算數成律度量衡)。
地理(圖)學		始於髀蓋(即周髀),古算法之一,「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故也稱蓋天。
算術(九章)		始於周禮。
機器製造		始於公輸般(削木人御馬),墨翟(刻木鳶而飛),武侯(作木牛流馬)。
物理學(格物)		陽燧取明火於日,方諸取明水於月。
化學		古所載「鑠金腐水,離木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此化學之出於我也。
光學		古云臨鑑立影,二光夾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於上;首被上光,故成影於下……
氣學		亢倉子云,蛻地之爲水,蛻水之爲氣。
電學		關尹子云,石擊石出光,雷電緣氣以生。

資料來源：鄭觀應，盛世危言正續篇，卷1，頁14-15，「西學」(1892)；邊事續抄，卷6，頁3-5。

總之，這種理論，認爲經史百家之說皆西學之源頭，牽強附會。於今日講，無絲毫說服力，然在當時文化自大的環境下，確曾發生一些作用。甲午以後，此說已爲識者所不齒。張之洞便是批評此說最的力一人。他說：

「今惡西法者，見六經古史之無明文，不察其是非損益，而概屏之……。是自塞也。」「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經典所言而傅會之，以爲皆中學所已有，……是自欺也。」^①

張氏又說，其實「萬世之巧，聖人不能盡洩；萬世之變，聖人不能豫知。」「謂聖經皆已發其理，創其制，則是；謂聖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②由於張之洞等人的批駁，此說遂喪失其影響力。代之而起，並確實在教育上發生影響力的，便是「中體西用論」。

「中體西用論」並非甲午以後突然出現的學說。它同其他理論一樣，也經過若

^① 張之洞，勸學篇（武昌，兩湖書院，光緒廿四年），頁四六，「會通」。

^② 同上書，頁四五，「會通」。

千時間與許多人的提出、討論、修改，逐漸形成，而於諸說中脫穎而出，成爲具有說服力的理論。張之洞是集其大成者。他的「勸學篇」是闡揚此說最具條理，自成體系的代表作品。最近臺北出版的「中國歷代思想家」一書沒有張之洞，實在是一種重大的疏漏。平心而論，在近代各家思想中，對清季政治及文化教育影響最大者，應以張之洞的「勸學篇」爲最。王爾敏以之爲「晚清中西調和理論之總結」，^①應是真知灼見。

在林則徐、魏源的時代，學者沒有提到中西學的問題，第一次提到中西學者，應爲馮桂芬，他於「校邠廬抗議」（1861）一書中指出採西學爲「今日論學一要務」，建議於廣東上海設一學堂，選穎悟文童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並由此而重學、視學、光學、化學、機械、造船諸學，以其皆「有益於國計民生」，而非奇技淫巧。在這裡馮桂芬首先將中西學同時放置在學堂課程之內，至於二者的關係，他認爲應以中學爲本，以西學爲輔。他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②馮氏何以強調倫常名教呢？這是他深感於中西通市後二十年來，西人習我國語言文字者甚多，而我國官紳對外國，「則懵然無所知」，於是不得不依賴「蠢榆謬妄之通事」，而這些人「率皆市井佻達，游閒不齒鄉里」之輩，「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外不知其他」，僅「略通夷語，間識夷字」，無心學問，且「又漸染于夷場習氣」。^③國家若依賴這些人辦理對外交涉，豈非壞事？馮氏針對這一現象，提出以經史倫常名教爲原本，其目的不外欲培養一批「品學兼優」，「讀書明理之人」，取代通事，辦理洋務，並探究西方學問，由粗入精，而超越於西人之上。^④

馮氏雖未採用中學西學的對稱句子說明他的主輔觀念，實際所論述者乃爲一事。這種理論在應用到教育措施時，較爲具體易行。那就是教育的目的首在培養品學兼優、讀書明理的人，重點在品德教育，經史倫常名教爲實現此目標之教材。次教以富強之術，西學爲實現此目標之教材。試觀北京同文館（1862）之課程內容，漢文與經學分配於八年之中。初入學者，每日以半日攻讀漢文，以後逐減，然須隨時

①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頁八二。

②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聚豐坊校刻，光緒廿三年），「采西學議」。

③ 同上。

④ 同上書，「上海設立同文館議」。

練習作文。至西語西學也依程度分配於八年之中。^{②⑤}至上海同文館（1863）招考新生，限定十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其西學課程包括英文、算學、代數、幾何、重學、天文、地理、繪圖等；中學課程，則包括經學、史學與詞章，「而以講明性理，敦行立品爲之綱。」^{②⑥}足見北京同文館着重文字表達；而上海同文館則強調品德。這正是馮桂芬所主張的「原本」。

與馮桂芬同時或稍後，出現一種比較抽象的理論，以中學爲道，以西學爲器，即所謂「道器說」。此種理論與馮桂芬的不同。馮氏的論理係從中西學的功能立說，而道器說則從中西學的本體（質）上發揮。王韜曾爲此說之代表。同治初年他說：

「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如徒頌美西人而貶己所守，未窺爲治之本原者也。」^{②⑦}

王氏此說並非反對改革，而是主張固守中國之道，摘取西國之器。他於一八八三年時說：

「夫孔子之道，人道。人類不盡，其道不變。三綱五倫，生人之初已具，能盡乎人之分所當爲，乃可無憾。……天開泰西諸國之人心，而畀之以聰明智慧，器藝技巧，百出不窮，航海東來，……挾其所有以傲我之所無，……，張其炫耀，肆其欺凌，……，則我又烏能不思變計哉！」又說，即「孔子而處于今日，亦不得不一變」，^{②⑧}故「其於西國舟車槍砲機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②⑨}

然其最後目標並不止於取西人之器，而進一步「融會貫通而使之同」。^{③⑩}光緒以後，採取此一觀點的士人很多，諸如湯壽潛、譚嗣同^{③⑪}以及鄭觀應^{③⑫}等是。

但道器的觀念比較玄虛，且不易應用到教育實際上去。於是又有人比馮桂芬更

②⑤ 孫子和，清代同文館之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民六六），頁二〇六～八。

②⑥ 同上書，頁三三六，三四二。

②⑦ 王韜，弢園尺牘（天南遐窟版，光緒二年），卷四，頁一〇。

②⑧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撰者印行，光緒廿三年排印本），卷一，頁九～一〇，「變法上」。

②⑨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一，頁一一～一二。

③⑩ 弢園文錄外編，卷一，頁二，「原道」。

③⑪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頁五七～八。

③⑫ 鄭觀應，盛世危言正續編（光緒一十九年），卷一，頁一～二，「道器論」。

明確地提出「本末」與「主輔」的觀念。提出者包括官紳與滿漢諸人，足見此種說法，較易為人接受。如一八九二年鄭觀應論西學時，從課程分配觀點主張應以中學為本為主，西學為末為輔。他說：

「故善學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後可。以西學言之，如格致製造等學其本也，……語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教學之效，其在茲乎！」³³

其實，上述本末、主輔的觀念已够清楚，然而也有人從「體用」的觀點去討論這些問題。「體用」一辭出於儒家經傳的注疏，其正確定義應該是：「體」指一事物的本質，「用」指一事物的功能。但沿用既久，往往引伸出許多新義，除可以與上述「道器」、「本末」、「主輔」各詞交互使用外，還可以包括「先後」的意義。「體用」本是抽象名詞，不能計量的，但也有人將之量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詞之出現，應在甲午以前。光緒十九年（1893）薛福成提出以中學為體，培養道德品性，西學為用，培養各項人才的觀念，並將之量化，他說：

「夫道德之蘊，忠孝之懷，詩書之味，此其體也。而論致用於今日，則必求洞達時務之英才，研精器數之通才，練習水陸之將才，聯絡中外之譯才。體用兼賅上也，體少用多次也。」³⁴

甲午以後，要求學習西方的言論比以前更加熱烈，而官方於各種言論中，採用了「體用」、「主輔」的論點。光緒二十二（1896）年七月，工部尚書孫家鼐於奏設京師大學堂時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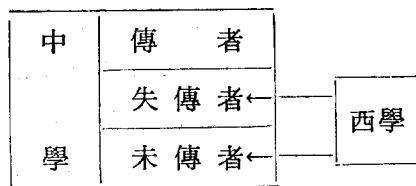
「今中國京師創立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其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³⁵

孫氏的論點是「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但應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令西學喧賓奪主，凌駕於中學之上。從課程分配上看，西學僅居於補充教材的地位，如下圖所示：

³³ 同上書，卷一，頁一四，「西學」。

³⁴ 薛福成，庸齋全集（上海醉六堂印，光緒廿三年），「出使奏疏」，下冊，頁二六～七。

³⁵ 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上海大同譯書局，光緒廿三年），卷五，上，「學校」，頁五，一八。



孫家鼐沒有說明這三類中學的內容，但從前述各種言論，不難知道他所指範圍。「傳者」當為經史百家之學，「失傳」及「未傳者」當為西方科學技術。雖美其名曰中學包羅西學，實則西學滲透中學障地，其主輔關係如何維持，不是一個口號，一句命令所能決定的。江蘇學者不察，竟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成立「蘇學會」時訂明章程，照抄孫家鼐的說詞，作為立會宗旨，^{⑤6}而沒有將其概念具體化。

張之洞是將這些概念具體化的第一人。他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發表「勸學篇」，有系統地綜合各種理論，創為「舊學為本，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之說，經過中央政府的認可與頒布，而成為正式的教育政策，深深地影響清末十餘年的文化、思想與教育。張氏除了採用「中學」與「西學」二名詞之外，還採用「新學」與「舊學」二詞，實際二者交互使用。惟所指舊學範圍較以前縮小，新學範圍則較以前擴大。「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⑤7}

就體用的觀點看，張之洞的意見較前人為廣大深刻。計包括了中西學之不同功能（效）、課程分配、施教程序與最後目標等層面。

在功能上言，中學的作用主要發揮在思想、品德、精神涵養、國家觀念與政治信仰等方面。而西學的作用則表現在物質建設方面。即他所謂「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社稷為第一要義。」^{⑤8}當受教國民有了正確的思想觀念、民族文化涵養、忠君愛國情操，與開濶的心胸，然後所學之西學專門知識與技能，方可有效發揮於正當的途徑上。不然，會發生危害社會國家的行為。他於「同心」、「教忠」、「明綱」、「知類」、「宗經」、「正權」各篇中，均充分表達了這種觀念。的確要比前人深刻。他於會通篇中更明確地說明中學的功能：

「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中學）不必盡索於

^{⑤6}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頁四九。

^{⑤7} 張之洞，勸學篇，外編，頁八，「設學」。

^{⑤8} 同上書，「序」，頁三。

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悌忠信爲德，以尊主庇民爲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爲聖人之徒也。如昏惰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國家顛隳，聖教滅冠，則雖弟佻其冠，神禪其辭，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詈之曰：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③

從學習心理上，中學爲體涵有先入爲主以立根柢與方向的意思。故於施教程序上，應先教中學，然後西學。否則學者將會迷失方向。張之洞說：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④

具體地說，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禮，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學西學才有益無害。「如中士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柁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⑤

張之洞勸學篇的另一貢獻，在中西學的課程分配方面。他主張簡化中學並擴大西學領域，無意以中學妨碍西學之發展。我們知道他在發表此書以前，學者們很少討論到中西學的課程分配問題。他指出古今時代不同，需要亦異，且精力有限，不能勉強人人通習全部經籍，故必須簡化。他說：

「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徧觀而盡職。……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⑥

他簡化中學的原則，以救世爲主義，「以致用當務爲貴，不以殫見洽聞爲賢。」具體地說：

「十五歲以前，誦孝經四書五經正史，隨文解義，並讀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圖式諸書，各漢唐宋人明白曉暢文字有益於今日行文者。自十五歲始，……統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小學各門，美質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學堂專師，或依此纂成學堂專書，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閒兼習西文。過此以往，專力講求時政，廣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慕功名之士，願爲專門之學

^③ 同上書，外編，頁四七，「會通」。

^④ 同上書，內編，頁二五，「循序」。

^⑤ 同上書，內編，頁二五～六，「循序」。

^⑥ 同上書，內編，頁二七～八，「守約」。

者，此五年後，博觀深造，任自爲之。然百人入學，必有三五人願爲專門者，是爲以約存博。……不必人人爲之也。」^{④③}

他這種簡化中學的精神，一直繼續下去，但貴切要實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並不希望人人成爲經史專家。後人根據他創設「存古學堂」的措施，而抨擊他復古，實則完全忽視了他「以約存博」，只希望百人中，有三五人專精於中學就好了的構想。

西學範圍，如前所說，張氏不僅增廣西學，使之包括西政、西藝與西史，且改變了梁啟超所指甲午以前教育「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之事少」^{④④}的輕重次序，而主張「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④⑤}「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鑛醫，聲光化電，西藝也。」^{④⑥}至於何種資質及年齡的人宜學西政，何者宜學西藝，如何在各級學堂中訂定優先次序，所需年限，以及二者的關係，張氏都曾有詳細的分析。他說：

「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中學堂先政而後藝。西藝必專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數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④⑦}

以上所引，僅是張之洞論及西學性質的一部份，其他開通之論不勝枚舉，謂之頑固守舊，是誣蔑先賢了。

總之，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主張「舊（中）學爲體，新（西）學爲用」的根本動機，是欲以國學去端正士人的思想方向，養成忠君愛國的情操，然後以西學去培養經世致用，能使國家富強的專業人才，以實現保國、保教與保種之最高目標。晚清及民初若干學人，不從此一觀點了解前人，而僅就體用二字本義發揮，大作文章，以爲張氏之說不通。對晚清學術思想有重大影響的嚴復，便是其中之一。他引用他人之語批評：「『體用者，卽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爲體，以馬爲用者也。』中西學之爲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

④③ 同上書。

④④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上海，中華，民二五），卷一，頁一四～二〇。

④⑤ 勸學篇，「序」，頁三。

④⑥ 勸學篇，外篇，頁九，「設學」。

④⑦ 同上。

立，合之則兩亡。」⁴⁸嚴氏雖主以「西學爲當務之急」，然也未排斥舊學，而這種批評與解釋，顯然僅就禮用二字之表面意義，而罔顧勸學篇全部內容，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誠爲不公之論也。

然從實踐觀點去看「中體之用」之調和力，則不無問題。即當中學經典的道統觀念，與西學所帶來的實用主義精神接觸時，可能發生矛盾與互相排斥的作用，因此，道統思想的統帥地位會發生動搖。清末各省學堂中新舊二派之爭，此起彼落，爲最好的證明。另一方面，由於時代需要與專業化的要求，必須迅速培養人才，中學課程的種類必然減少，內容必然繼續簡化，而西學課程必然不斷增加，並逐漸專門化。因此，在課程質量方面，產生了「西學爲主，中學爲輔」的關係。這種關係，於清末已經出現，民國成立以後尤爲顯著。這是張之洞所預想不到的。

「中體西用」的原則，經過「奏定學堂章程」(1904)的頒佈，而於全國各級學校中實施。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爲教育宗旨。西政、西藝、西史於是大量引進中國。然不數年便發生不能兼顧的困難。宣統元年(1909)三月學部曾擬變通中學堂課程，分爲文實二科。分科的理由是：(一)學生志趣不同，資性亦異，(二)學文科者要求精深，學實科者尤期純熟，而「中國文學既難，加以科學又極繁重」五年內實難於兼通，故應分科。令有志從政者讀文科，有志謀生者讀實科。至中西學課程的分配，決定：文科採「中學爲主，西學爲輔」；實科採「西學爲主，中學爲輔」的原則。⁴⁹此一辦法經過各省討論後，認爲條件不足，文實壁壘不宜過分森嚴而作適度修改，於宣統二年底(1911)公佈，但不久因革命事起，沒有實施。⁵⁰

總之，在清末的數十年間，中國的傳統教育受到極大的挑戰，挑戰的領域主要包括制度與課程二方面。制度的反省與改革比較遲緩，但在課程方面的反應，則以理論的形式出現。其實，前述各種學說，不論正反二面，其討論者均不出下列三種主題：西文、西藝與西政。從教育思想的發展觀點立論，從1862年至1894年間是「西文教育思潮」及「西藝教育思潮」同時盛行的時代。馮桂芬、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爲主要代表。1895年以後，過去的西藝教育因戰敗而受到抨擊，轉爲「西政教育思潮」所取代，即所謂西政爲主，西藝爲輔的時代。康有爲、梁啟超、

⁴⁸ 嚴復，「與外交部主人論教育書」(一九〇二)，在嚴幾道文鈔，卷四，頁一八～九，轉引自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一九六三)，頁九八九～九九四。在此文中，嚴氏主張以救愚、貧、弱三者爲急務，而又以救愚爲首，不論新學舊學，皆應以實現此目標爲原則。

⁴⁹ 教育雜誌，卷一，期五(宣統元年四月廿五日)，總頁三九五～四〇二，教育法令，「學部變通中學堂課本分爲文科實科摺併單」。

⁵⁰ 教育雜誌，卷二，期三(宣統二年三月十日)，總頁一五〇九～一五一；卷三，期三(宣統三年三月十日)，總頁二六九七，「法令」，「學部奏改訂中學文實兩科課程摺併單」。

張之洞等人爲此期之主要代表，而由張之洞集其大成，付諸實行，發生具體影響。中國教育之現代化始基，於是奠定。

二、民初教育思潮的蓬勃發展

民國成立以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均發生劇烈的轉變，教育思想自然跟著迅速改變。

政治方面，由專制而共和，由共和而開洪憲帝制。于袁世凱死亡前，南北對立；袁氏死亡後，南北內部也有紛爭，全國均由軍閥統治。由于政治上的不安，與軍閥忙于爭奪，無暇他顧，故于 1912 年至 1927 年間，是文化思想界的「自由假期」。雖然 1922 年後，北京政府有過「取締新思想的議案」與行動。^①但實際有效範圍是值得懷疑的。

在經濟方面，農業衰落，農村凋零；但工商業因外國投資增加，及歐戰期間民族工業的勃起而迅速發展，沿海城市較前繁榮。社會階層分化加速，於城市主要分爲中產階級、工人階級以及來自農村的失業者。在 1920 年以前，城市中產階級扮演社會革新的重要角色。

國際政治方面，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加劇，1915年的廿一條，及1919年巴黎和會日本從德國取得山東利權，激起反日的民族主義高潮。

在社會文化方面，如前所說，由于政體的改變，人們的思想迅速從清末的「中體西用」範疇裏解放出來，吸收更多新的養分。加以返國留學生的媒介作用，加速新思想的輸入，推動了發生于 1915 年至 1923 年間的「啟蒙運動」。^②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斯主義、科學主義、國粹主義等等，互相激蕩，真是百家爭鳴的極盛時代。教育思想尤其要受這些因素的影響。

民國元年後的教育思想表現於下列幾個方向：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科學教育、民主主義教育、平民教育、國家主義教育，與教育獨立主張等。提倡這些教育思想的有蔡元培、胡適、黃炎培、莊俞、梁啟超、蔣夢麟、丁文江、任鴻隽、晏陽初、陶知行等人。

1. 軍國民教育主義：所謂軍國民教育主義者，係主張文武合一教育，透過教育

^①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民六六），頁二五九。

^② 同上書，頁二五六。

手段，培養國民之戰鬥意志與技能，以應保衛國家之需要。這種思想的產生，一因長期以來受外國帝國主義之侵略凌辱，一因社會達爾文主義之輸入。早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張之洞就于勸學篇中提倡兵學，以武力為公理後盾，保持兵力以維持和平⁵³，並于湖北各學堂實施文武合一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奮翮生作軍國民篇，蔣百里作軍國民教育篇，鼓吹此種思想。光緒三十二年（1906）部頒教育宗旨也有「尚武」一條。宣統三年（1911）各省教育總會決議「請定軍國民教育主義案」，請學部頒行。⁵⁴民國以後，政體雖變，國際之壓力依舊，甚至加亟。民國元年，蔡元培為教育總長，二月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第一條即主張「軍國民教育」。他說：

「清之季世，……騰于教育家之口者，曰軍國民教育。夫軍國民教育者，與社會主義併馳，在他國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國，則強鄰交逼，亟圖自衛，而歷年喪失之國權，非憑借武力，勢難恢復。且軍人革命之後，難保無軍人執政之一時期，非行舉國皆兵之制，將使軍人社會永為全國中特別之階級，而無以平均其勢力。則如所謂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所不能不採者也。」⁵⁵

由此觀之，蔡氏倡軍國民教育之目的，不僅在保衛國家，抵抗強權，收復權利，且在防範軍人專政。民國三年（1914），范源廉（1876-1928）于「今日世界大戰中之我國教育」一文中，強調須「振尚武之精神」。⁵⁶民國四年（1915）日本以廿一條壓迫中國，民族主義高張，袁世凱以衛國為理由，特定「尚武」為教育宗旨之一。同年四五月間，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遂有「軍國民教育實施方法」的決議案。⁵⁷這種思潮于歐戰結束後（1919）曾一度為世界和平主義所淹蓋。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1920），提倡和平，反對戰爭與軍國主義教育。⁵⁸同年五月，蔣夢麟于「教育評論」一文中也主張以民主主義教育取代軍國主義教育。⁵⁹然而這種和平主義，乃一廂情願之想法。巴黎和會失敗，喚醒了國人對和平的幻夢，國內軍閥的

⁵³ 張之洞，勸學篇（武昌，兩湖書院，光緒二十四年），外篇，「兵學」，「非弭兵」。

⁵⁴ 陳啓天，近代中國教育史（臺北，中華，民五八），頁一〇八～一〇九。

⁵⁵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1963），頁一〇三一～二。按蔡氏此文，最初發表於民國元年二月十一日出版之「臨時政府公報」十三號及同年二月八日至十日之民立報，而非舒書所載之四月，此項考證係陶英惠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⁵⁶ 同上書，頁一〇六四～一〇六八。

⁵⁷ 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臺北，商務，民五〇，影印本），頁五八。

⁵⁸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食貨雜誌社，民六七），頁一八五～一八八。

⁵⁹ 蔣夢麟，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上海，商務，民二二），頁四三四～四五七。

戰爭，以及民國十四年（1925）的五卅慘案，使軍國民教育思想，更昌盛起來。同年十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決議各級學校實施軍事訓練辦法如下：

(1)高級中學以上學校，一律施行軍事訓練，並授以軍事學。

(2)小學及初級中學應實行強迫童子軍訓練，初中年齡較大者，酌情施行軍事訓練。

(3)施行軍事訓練之學校，課外運動及體育時間，仍應酌量保留。

(4)平民學校亦應盡所能施行軍事訓練。^⑩

總之，這種軍國民教育思潮，由于列強壓迫與民族主義之伸張，自晚清起激盪于教育界。惟因受客觀條件限制，其實行的範圍及持續性均不如理想。十四年的全國教育聯合會決議案，是較有效力的一次，但全國並未一律實行，而僅由各級學校酌情自由辦理而已。直到十七年全國統一以後，才較確實地全面付諸實施。

2.實利主義教育：前面說過，世界各國之近代教育發展主要特徵之一為科技化(Polytechnization)，意指教育必須配合社會經濟發展，朝向實用科技與職業教育目標前進。實利主義教育思想，為實現此目標之基本精神。清末的西藝教育思想與中體西用思想，已具有這種傾向。1906年的教育宗旨已明確以「尚實」為指標。足見此一思潮頗受重視，且于清季的實業教育方面發生很大的影響。這是不容置疑的。民國元年，蔡元培繼續強調此一方向，他說：

「雖然，今日之世界所恃以競爭者，不僅在武力，而尤在財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財力而孳乳。于是有第二之棟屬政治者，曰實利主義之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其主張最力者，至以普通學術，悉寓于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說創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歐陸。我國地實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之急者也。」^⑪

故列為民元教育宗旨之一，以充實國民生計，發達國家生產事業，謀求國家之富強。此乃世界潮流，不足為奇。即對蔡氏「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頗多非難之陸費逵，也主實利主義教育。^⑫民國四年（1915）一月，袁世凱頒定教育宗旨七條，

^⑩ 陳啓天，近代中國教育史（臺北，中華，民五八），頁一九九～八；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一三五。

^⑪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頁一〇三二。

^⑫ 陳啓天，同前書，頁一九八～九。

「崇實」仍為其中之一。⁶³故不論政治體制及主政者為誰，其受重視應無疑義，惟所受強調之方向與範圍或因時而異。民國二年（1913）由于多年來的西藝教育多強調課本之理論知識，缺乏實際應用，使學校教育與社會脫節，受教者反而成為無用之人。教育界有識之士提出檢討，並進而提倡「實用主義教育」，擴大實利主義之範圍。其實此種說法乃接承清代「經世致用」主義之餘緒而已。張之洞不亦于「輜軒語」（1875）一書中說過，「讀書期於明理，明理歸于致用」⁶⁴嗎？明確地說，不僅是後來增設的理、工、農、醫、商各科須明理致用，即文、史、哲各科又何獨不然？然而教育實際是受許多因素限制的，往往一種正確的主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未見實效。實用主義教育，便是一例。民初倡議採此說者很多。黃炎培提倡于前，莊俞、梁啟超呼應于後。民國二年（1913）八月，江蘇教育司長黃炎培，有見于各校課程，重記誦而不知應用，社會與學校脫節，復受美國來華考察教育現狀之教育家孟祿（Paul Monroe）之影響，而首倡「實用主義教育」，先就小學各科，擬定一以實用為目的之教材教法改良大綱，公諸于世，請教育界批評。並附錄德、美、英三國實用教育實況報告，喚起教育界之反應。⁶⁵同年，莊俞發表「採用實用主義」一文，首先響應黃氏，他說：

「學制公布，學校議建，學生驟增，表面觀察，今日教育豈不曰有進步？然而一則虛偽，二則剽襲，三則矜夸，四則敷衍。一言決之，如此現狀，於國家鮮有實際……欲救今日教育之弊，非勵行實用主義不可。何則？虛偽剽襲，矜夸敷衍，無一不與實用為極端之反對。實用主義不得推行，則此種積弊，決難掃蕩廓清。今日教育家可不于此三致意乎？」⁶⁶

此說倡行一年後，江蘇上海各小學有熱烈的響應，安徽、江西、浙江、山東、直隸各省尚少實行，然教育界諸人對黃炎培氏之來訪，「一見傾心，莫不以實用主義為其談話之資料。蓋此四字即于一般教育者之腦海深矣。」⁶⁷教育總長湯化龍與黃氏晤談時，亦「言中學教程，應注重科學，科學應注重實用。」⁶⁸次年（1915），

⁶³ 舒新城，同前書，頁二四八～二五七。

⁶⁴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民五二，影印），卷二〇四，輜軒語，頁三五。

⁶⁵ 教育雜誌，卷五，期七（民二年十月十日），總頁五六三九～五六六六。

⁶⁶ 同上書，卷五，期七，總頁五五三七～五五四〇。

⁶⁷ 同上書，卷七，期一（民四年一月十五日），總頁八〇二二～六「言論」，黃炎培，「實用主義產出之第一年」。

⁶⁸ 同上。

此種思想，由民間之推動，影響政府，形成決策。袁世凱乃于新頒教育宗旨中申明「注重道德實利尚武，並運之以實用，說明以道德實利尚武教育為體，以實用主義為用。」⁶⁹出版物以實用主義為標題者也日多，「教育會議以是為議題者，亦復不少」，漸成一股潮流。黃炎培于是年夏訪美歸來，復以美國教育，「凡所設施，無一而非實用」為言，對以前之主張，信心倍增，而有「世安有不實無用而尚得謂教育」的豪論。⁷⁰惟因實用主義一詞，稍嫌抽象空泛，而社會生計，一因百業不知改良，二因各種學校學生失業日增，日感恐慌，歸根究底，在職業教育之缺乏。於是實用主義教育思潮，自一九一六年起轉變為職業教育思潮。此年，名實業家與教育家張謇（1853-1926）在南通師範設農工科，江蘇第一師範試辦農業，第二師範設商業科，並準備設商業實習室。而全國教育會議亦決設中學校自第三年起，就地方情形酌授職業科，「是為中學注重職業之嚆矢」。八月，江蘇省教育會年會全體一致決議，「組織職業教育研究會，是為職業教育設立團體之嚆矢」。此外，小學教育研究會、上海縣立女子高小，也有具體的響應。不僅江蘇之反應如此，江西省于此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全省學校成績展覽會上，亦趨重職業與實用教育。是此一思潮，也漸影響于內地。⁷¹民國六年（1917）一月，梁啟超于「中國教育之前途與教育家之自覺」一文中，對民元以後之教育未脫科舉餘習，學問不求實用，言文不一致，以及學校與社會脫節等弊端，予以批評。主張學校教育應為未來社會生活之準備，所有課程必須以實用為依歸。⁷²此種抨擊，加強了實用與職業教育之推展。中華職業教育社也于是年成立，發行「職業與教育」雜誌，提出各科職業訓練的理想與目標，供各校參考使用。⁷³這種職業思潮，于美國教育家瑟婁（T. H. P. Sailer）之來華考察（1915年12月）⁷⁴及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來訪（1919-1921），⁷⁵獲得廣泛的認識，而于民國十一年（1922）的新學制中，取得相當地位。⁷⁶其重

⁶⁹ 教育雜誌，卷八，期一（民五年一月十日），「言論」，總頁九七〇五～七，黃炎培，「實用主義產出之第二年」。

⁷⁰ 同上。

⁷¹ 教育雜誌，卷九，期一（民國六年一月二十日），「言論」，總頁一一四〇九～一一四一二，黃炎培，「實用主義產出之第三年」。

⁷² 舒新城，同前引書，頁九五六～七。

⁷³ 陳啓天，同前引書，頁二〇一～三。

⁷⁴ 教育雜誌，卷八，期三（民五年三月十日），「特別記事」，總頁一〇〇〇～一〇〇六。

⁷⁵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77)。

⁷⁶ 陳啓天，同前引書，頁二〇三，二三〇～一。

要性與科學教育一樣，愈來愈受注意。而張謇為國內私人倡導實業教育成績最著之一人。^⑦

3. 科學教育：實用主義教育與平民教育，從對象言，偏重初等及中等學校學生及社會大眾；在課程內容上，則偏重日常生活所需之基本知識及職業知能。而科學教育，則偏重高等專門知識及科學精神與方法。

這種思想，發端于清季之西藝教育，惟清季倡導西藝教育者多偏重科學知識與技能，而忽視其精神與方法。甲午以後，嚴復提倡科學教育。1903年他著「救亡決論」，說明科學方法在從反覆之試驗中求得定理定律；科學態度在去成見、飾詞、主張與武斷，而須虛心、公正、勤奮與忍耐，始能達至精至誠之境界。他說：

「西學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為不易，其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恆，故悠久。其究極也，道通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見必不可居，飾詞必不可用，不敢絲毫主張，不得稍行武斷，必勤必耐，必公必虛，而後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踐其至實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間，則據理行術，操必然之券，責未然之效，先天不違，如土委地而已矣。且西士有言，凡學已高，不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其絕大妙用，在于有以練智慮，而操心思，使習于沈者不至為浮，習于誠者不能為妄……。」^⑧

這種科學態度、精神與方法，確為真知灼見，然而清季學者官吏多未能領悟，民國三年（1914）夏，中國留美學生於美發起成立中國科學社，四年（1915）一月，發行科學雜誌，提倡科學。其中，任鴻雋^⑨以「科學與教育」為題，主張科學於教育上之作用，不在科學知識，而在科學方法之訓練與重事實，求理性的科學態度之培養，一如嚴復所見。任鴻雋說：

「科學於教育上之重要，不在於物質上之知識，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與心能之訓練科學方法，首分別事類，次乃明辨其關係，以發見其通律。習于是者，其心嘗注重事實，執因求果，而不為感情所蔽、私見所移。所謂科學的心能者，此之謂也。……以此心能求學，而學術乃

^⑦ 瞿立鶴，張謇的教育思想（臺北，學生書局，民六五），頁二五一～二六二。

^⑧ 舒新城，同前引書，頁一〇〇〇。

^⑨ 任鴻雋，四川人，美國康奈耳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學士，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碩士，1920年出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長。

有進步之望；以此心能處世，而社會乃立穩固之基……。」⁸⁰

從此以後，提倡科學的言論愈來愈多。江蘇省的留美學生陳容，奉派考察歐美教育後，于民國四年（1915）初，呼籲國人以「物質科學及社會科學」為我國思想發展之正軌，而學校與課程之編訂尤為培養此種思想之重要手段。⁸¹

民國七年（1918）初，蔣夢麟於其「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之關係」一文中也指出，今日為「科學精神之時代（The Age of Scientific Spirit），一切政治學術思想，無不貫之以科學，故廿世紀為科學時代」。此精神為何？他說，「好求事實，使之證明真理也。凡鑿空臆度之學說而自以為真理者，與科學精神相反對者也。」⁸² 蔡元培于民國八年（1919）一月著「哲學與科學」一文，謂二者之差異在「科學偏重歸納法，……哲學偏重演繹法……。」⁸³ 並詳細介紹了西方哲學與科學思想發展之過程。當然，「科學雜誌」之影響不可忽視，諸如唐鈺的「科學與德行」，郭秉文的「科學與農業」，金邦正的「科學與林業」，楊銓的「科學與商業」等是。此種思想，很快地因為杜威的訪華，及其哥倫比亞大學弟子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宣傳鼓吹，以「實驗主義」的形態出現，支配中國之教育界者三十年，對其他哲學、史學、政治思想與文學均有相當的影響。⁸⁴ 杜威於民國八年（1919）應江蘇省教育會與北京大學之邀請，在五四運動前三天到達中國，原計劃停留數月，後因對中國發生好感，繼續訪問二年，在各地作了許多次演講。他的思想叫「實驗主義（Pragmatism）。這種主義，最重要的一點在認為思想是解決問題的工具，其運用思想解決問題的方法，採用就事論事，理性化的科學方法。有如科學家在實驗室中所採用的方法一樣。其思考步驟如下：

- (1)發現疑惑與困難情境。
- (2)研究事實真相，確定問題性質。
- (3)提出各種假設與解決方法。
- (4)付諸試驗印證。
- (5)獲得結論，解決了問題。⁸⁵

⁸⁰ 陳啓天，同前引書，頁二〇六。

⁸¹ 教育雜誌，卷七，期一（民四年一月十五日），「言論」，總頁八〇三四～四一，陳容，「現今我國思想應趨之正軌」

⁸² 教育雜誌，卷十，期二（民七年二月二十日），「言論」，總頁一三一六五～一三一八〇。

⁸³ 孫德中編，蔡元培先生遺文類鈔（臺北，復興書局，民五〇），頁一六一～一六六。

⁸⁴ 胡適，胡適演講集（南港，胡適紀念館，民五九），中冊，頁三二七～三三〇。

⁸⁵ 同上書，頁三三〇～一。

胡適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⁸⁶兩句話，指出這種科學方法的精神所在。可是，這種實驗主義思想，對民初的科學教育，並未產生立即的影響。基本原因當然是政局不穩，教育經費不足，科學人才缺乏所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祿 (Paul Monroe) 于民國十年 (1921) 九月應實際教育調查社之聘來華調查教育，他發現中學之科學教法失敗，原因在缺乏良好師資、儀器設備，單憑記誦名詞而無實驗機會。⁸⁷翌年 (1922)，中華教育改進社聘請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之教育學教授推士博士 (Dr. George R. Twiss) 來華考察科學教育，共訪問十省二十四市，一九〇所學校，作一七六次演講。⁸⁸臨行前於民國日報發表「科學教育與中國」一文，首述科學教育的重要及美國青年研究科學教育的方法，繼指出中國物質文明不能進步的最大原因，在科學教育之不發達。他認為「科學教育是民本主義的根本」，中國要振興工業應以農、鑛、林三項為優先。換言之，應偏重農林鑛及交通運輸等方面的科學教育。⁸⁹

科學教育思潮，對科學教育實際雖沒有產生立即的作用，可是對學術研究，卻發生顯著的衝擊。地質學會、地質圖書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機構，在民國十一年 (1922) 裡先後建立起來。⁹⁰並引發一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結果取得勝利，辯論的主角為張君勱與丁文江。民國十二年 (1923) 二月十四日，張氏在清華大學講「人生觀」，據柏格森的直覺主義，認為科學無論如何發達，物質如何文明，決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人生觀由玄學而建立，受玄學所支配。同年四月十二日，丁文江發表「玄學與科學」，本杜威的實驗主義，對張氏發動攻擊。丁認為要用科學方法講求是非真偽，以求人生觀的統一。又認為科學方法可以應用到所有人生問題上去。以後胡適、吳敬恆、陳獨秀等支持丁文江；梁啟超等支持張君勱。結果，科學的人生觀居于優勢，論戰於是結束。⁹¹

此外，科學教育的提倡，對教育學之科學化，也產生很好的成績。科學方法既可以應用到人生的全部問題上去，教育學本身何獨不然。何況自清末以來，教育雜

⁸⁶ 同上書，頁三三一。

⁸⁷ 教育雜誌，卷十四，期二 (民十一年二月二十)，總頁一九四八五～九一，「教育界消息」，「再誌孟祿博士來華後之行踪與言論」。

⁸⁸ Keenan, *Op. cit.*, p. 85.

⁸⁹ 東方雜誌，卷二十，期六 (民十二年三月二十)，總頁五四〇三八～九，「科學教育與中國」。

⁹⁰ 任鴻雋，「民國十一年教育的回顧」，在教育雜誌，卷十五，期一 (民十二年一月二十日)，總頁二〇九一一～四。

⁹¹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三一四～五。

誌等刊物已陸續介紹西方教育原理與方法。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以後，智力測驗、教育測驗、學務調查、社會調查等方法已經由中國的教育工作者應用到本國的教育研究上去，產生良好成績。^②

對科學教育本身也由觀念之傳播進入具體行動階段，民國十二年（1923）八月十日至十三日，正在科學與玄學論戰期間，中國科學社在杭州教育會召開第八次常會，與會者三十餘人。社長任鴻雋致詞，指出該社今後工作目標如下：（一）發行雜誌，（二）編譯書籍，（三）編定科學名詞，（四）設立科學圖書館，（五）設立科學研究所，（六）設各種博物館，（七）舉辦科學演講，（八）舉辦團體旅行，（九）接受各機關之科學研究委託。會中馬君武講「科學與宋儒」，胡君復講「最近教育趨勢之科學觀」，翁文灝講「何謂地質學」，汪精衛講「個人對於科學之概念」。並討論中學科學教授法之改進問題。翁文灝建議，科學社應編定科學教師參考書目及各校科學儀器標本最低標準，主張注重實驗，少談理論，多做問題。^③次年（1924）便首先于江蘇省推展科學教育。^④總之，科學方法之提倡，已逐漸應用到中國的教育、學術與社會等方面去，發生相當的影響。

4. 民主主義教育思想：這是二十世紀初盛行於美國，而由美國直接輸入我國的一種教育思潮。在中國發生相當的影響，值得注意。

民主主義教育為保持及實現民主政治的工具，故其哲學基礎，為民主政治，與開放自由之社會。我們可從美國民主主義教育發展的歷史線索中，尋找到這種關係。名教育史學家克里門(Lawrence A. Cremin)認為教育普及化(Popularization)是美國教育的基本精神與特質，其發展線索係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經曼氏(Harace Mann, 1796-1859)至杜威，雖然此一觀念到了杜威，已稍改變其重點。傑佛遜認為教育與民主政治有不可分割性。他說：

「如果一個有文化的國家同時期待愚昧與自由，那麼，過去沒有，將來也永遠不會出現。」^⑤

^② 陳啓天，同前引書，頁二〇七。

^③ 教育雜誌，卷十五，期九（民十二年九月二十日），總頁二二三六九，「教育界消息」，「中國科學社常會開幕」。

^④ 教育雜誌，卷十六，期五（民十三年五月二十），「教育界消息」，總頁二三八二三～四，「中國科學社推行江蘇科學事業之計劃」。

^⑤ Lawrence A. Cremin, *The Genius of American Education* (N. Y. Vintage Books, 1965), p. 5. 按克里門氏為哥大師範學院教授、院長，著作等身。

因此，要保有民主自由，必須人人接受教育，脫離愚昧。惟傑佛遜主張學校教育，供給技能與基本知識，而讓報紙與實際政治參與教育人民有關公民的知識。此種觀念，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由曼氏等教育家進一步提倡設立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及其他社會教育機構，作為實現大眾覺醒（Popular enlightenment）與人類進步（Human progress）的門徑，產生了很大的結果。二十世紀初，杜威承接了此一精神與特質，但改變了美國民主教育的基本型態。他的「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1916）一書，為美國教育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⁹⁶此書主旨在尋出民主社會之基本觀念，並應用到教育事業方面去，解決問題。⁹⁷杜威認為階級制度在一民主社會中，並不存在。社會全體成員分享社會共同利益，社會成員及社羣間之自由交往互動，及不間斷的調整適應，是允許的。⁹⁸基于這些觀點，杜威認為，民主教育應包括二項要素：（一）發展智能的個性（Intellectual individuality），（二）培養共同活動的觀念（Co-operation in activity）。⁹⁹前者注重培養個人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後者培養互助合作的天性。為實現此目標，學校必須比照社區組織起來，學習必須與社會生活關聯。杜威用「統一律」（The principle of unity）解決了各種二元論的矛盾，諸如貧與富，勞心與勞力，政府與人民，靈與肉，心與物，經驗與理性，知與行，理論與實際，學校與社會等。他反對傳統的貴族式教育，主張普及教育，而此種教育內容又必須同時適應社會需要、個人能力與需求。¹⁰⁰在學校與社會關係方面，杜威認為學校有二大任務；（一）適應社會之需要，（二）帶動社會之變遷與進步。¹⁰¹他認為公立學校（Common school）是社會之「熔爐」（Melting pot），可化除各種社會障礙，供給自我實現的工具與服務社會的精神，以保證大社會的和諧與進步。¹⁰²在學童與教材（課程）之間，強調學童比教材重要，施教時應利用兒童的生活經驗，並注意其能應用所學于社會生活¹⁰³。總之，杜威的民主主義教育思

⁹⁶ *Ibid.*, pp. 6-12.

⁹⁷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ian Co., 1916), P. V.

⁹⁸ *Ibid.*, P. 100.

⁹⁹ *Idid.*, p. 357.

¹⁰⁰ *New York Times*, Nov. 1, 1931.

¹⁰¹ John Dewey, *Dewey on Education: Selections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artin S. Dworkin* (N. 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 1959), p. 31.

¹⁰² John Dewey, *The Child and Curriculum an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6), p. 29.

¹⁰³ *Ibid.*, p. 75.

想，認為教育是個人繼續成長的歷程，「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這種觀念，不獨對中國教育是新鮮的，即對美國的教育而言，如前所述，也是革命性的。

杜威是於民國八年（1919）五月二日到中國訪問，停留二年零二個月，于十年（1921）離去。他訪問了十一省，作了無數公開演講，傳佈他的哲學及教育思想。在他來華以前，他的學生胡適、蔣夢麟等人，已在國內介紹他的思想，作了鋪路工作。然而，胡適所扮演的角色僅是杜威教育思想的傳播者，並非實踐者。杜威在華的演講，引起熱烈的反應，有許多人以筆名發表其在教育上的應用原則，諸如木心的「教育與德謨克拉西」，隱青的「德謨克拉西教育之實施法」，天民的「德謨克拉西與學校管理」，太玄的「德謨克拉西與訓練」，及「德謨克拉西與學校課程」。^⑩木心的文章，強調應透過家庭與學校培養民主的國民性格，教師應尊重學生人格，師生平等，教學法應以啟發代替注入主義，教師應居于輔導立場，鼓勵學生自治活動，不宜干涉。尤要者，教育對象應普及化(Popularization)。^⑪隱青的文章則提供下列具體的實施辦法：

(1)使一般人民皆有受教育機會者：學校公開於社會平民，私立學校宜加提倡，注重女子高等教育；改良文字使知識普及，及各地方多開音樂會、美術展覽會等。

(2)改革教育制度及教學方法者：規定義務教育年限（自六、七歲至十四、五歲）；以兒童為第一位，教師與教材為第二位；教學不貴於知識之灌輸，應重養成獲得知識之能力；知識為人生之手段，其價值全在實用。教學時當捨學年制度而採學科制度，學科與學科間應有密切之聯結等。

(3)務使學校社會化：作到「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⑫

此外，還有許多介紹與實驗，使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中國發生很大的影響，除實驗主義已于前面介紹，及「平民教育運動」將于下節敘述外，在中國教育體制及精神之改變作用也很大。如教育行政與學校行政由集權走向分權；男女平等，學校開放女禁；課程編制由刻板而活潑；試驗各種新教學方法；教育研究風氣興起；教育刊物盛行；試驗學校之設立，實驗教育理論，及實行學生自治等，^⑬都是具體而真實的。

^⑩ 教育雜誌，卷十一，期九（民八年九月二十日），總頁一五七五五～一五八〇九。

^⑪ 同上書，總頁一五七四一～六。

^⑫ 同上書，總頁一五七六五～一五七七二。

^⑬ 陳啓天，同前書，頁二一〇～二一一。

5. 平民教育思想：杜威的教育哲學來到中國以後，經由不同媒介而發生不同方向的影響。如前所述，胡適、蔣夢麟及筆名木心、隱青等人，將杜威的思想引向民主精神及個性發展方面，是屬於教育原則與方法問題，他們屬於杜威思想的右派。但另一部份人，如晏陽初、陶知行等，則捉著教育普及化（Popularization）的重點，提倡「平民教育」，並積極推行，引起一陣狂風。他們應屬於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左派。前者使中國正規教育現代化，後者要求教育迅速普及于平民。二者均符合中國社會之實際需要，而重點與方向不同。

平民的定義，據晏陽初（1894- ）的解釋，狹義指一般失學的青年和成人，廣義指一般粗通文字，沒有常識的男女。中國的人口，有百分之八十屬於這一類。平民教育的目的在造就一個有知識能力，有生產能力與公德心的人。所以所要實施的教育有三：（一）文字教育，培養民智。（二）生計教育，培養民生。（三）公民教育，培養民德。^⑩

平民教育運動（簡稱平教運動）發生於杜威訪華以後。民國八年（1919）十月，北京高等師範生受杜威在上海講學的影響，首先組織「平民教育社」，翌年創刊「平民教育週刊」（*Democracy and Education Weekly*），以「研究、宣傳及實施平民教育」為宗旨。他們的觀念雖強調「平民」而非「貴族」，然教育目標則與後來晏陽初、陶知行等人所創導的有別，即比較接近杜威的理想。他們認為，平民教育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是要「教國民人人都有獨立人格的平等思想的教育」，是「造就一般公民的教育，不是造就少數貴族或有特殊勢力人的教育。」^⑪

民國九年（1920），晏陽初從美國留學回來，以其在法國辦理華工教育的理想與經驗，在國內原有的基礎上推展平民教育。他先費一年多的時間作平教調查研究，然後于十一年（1922）到華中湖南長沙市作第一次試驗，獲豐富的成績，受到政府及民間的重視。十二年（1923）初，分別到山東煙台及浙江嘉興、杭州、南京及武漢等處試驗，同樣獲得熱烈的反應。在嘉興，晏氏採用了幻燈教學法，熊朱其慧及陶知行等大受感動，而加入平教運動的陣營扮演重要角色。同年八月，晏陽初、陶知行、熊朱其慧、朱經農等人於北京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有二十省代表參加。總會成立後，各省市亦紛紛響應。至十四年（1925）止，共

^⑩ 晏陽初，「平民教育概論」，在教育雜誌，卷十九，期六（民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總頁二九六八一～三。按晏氏，湖南人，香港大學，耶魯及普林斯頓大學畢業，非杜威之及門弟子。

^⑪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三三六。

有十七個省成立了平民教育促進會，及二十三個市平民教育促進會。並進而由城市推廣到農村。民國十三年（1924）十一月，晏陽初於河北保定二十餘縣農村試驗平民教育，受教者五萬多人。^⑩十四年以後，中國的平教運動，已受到國際的重視。而總會內部組織的擴充，職員素質的提高，工作人員的增加，有關平教刊物的發行，及研究與實驗都繼續加強與推進。^⑪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佔據重要的一頁。

6. 國家主義教育思想：與民主主義教育不同，國家主義教育以國家之富強為目的，教育是國家完成目的的手段。它是國家的事業，必須由國家控制經營，不得由私人、黨派、地方權力、教會或外人所辦理。個人也是國家的手段，因此于施教時，不重視個性發展、思想獨立與興趣主義，而強調國家意志、團體紀律、服從與犧牲。

這種思想，在清末及民初的軍國民教育思想中，已含有一點成份。於民國元年的臨時教育會中，劉以鐘、吳曾祺首次提出「請決定相對的國家主義為教育方案」，審查結果，雖同意以國家為中心，但以其違背世界潮流與個性發展原則，^⑫而沒被採用。及五四運動及杜威等美國教育家來訪以後，民主主義思想風行全國，國家主義教育益不受重視。民國十二年（1923），余家菊、李璜等發表「國家主義的教育」一書，重提此說，引起教育界的注意。因五卅慘案激起團結愛國情緒，而凌駕民主主義教育之上。至十六年（1927）受國民政府之禁止而削弱。此說之基本理論如下：

(1) 教育是一種國家主權，不屬於任何私人、黨派、地方、教會團體及外國個人或團體。如果教育主權分屬於外國、私人、地方和教會，則國家之主權受到分割而不能獨立。故教育權不能視同產權，可歸私人所有，必須全歸國家所有。

(2) 教育是一種國家事業，國家為辦理此事業的主體。在某範圍內，可容許私人 and 地方辦理教育事業，但不得視為慈善事業、宗教事業，及國際事業。而且必須受嚴格的國家監督（State control）。

^⑩ 湯茂如，「平民教育運動之經過」，在教育雜誌，卷十九，期九（民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總頁三〇〇八五～九〇。按湯茂如為金陵大學、北京師大學士，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及博士候選人。

^⑪ 同上書，總頁三〇〇九一～三。據民國十六年的調查，北京平民教育促進會重要職員十一人中，有博士四人，碩士二人，學士五人。就留學國別統計，留美六人，留日四人，國內畢業者僅一人。資料見教育雜誌，卷十九，期九（民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總頁三〇〇九四～三〇一三八。至總會組織系統圖，見總頁三〇〇九二。

^⑫ 陳啓天，同前書，頁二一一。

(3)教育是一種國家工具，在國家手裏，便可救國建國；不在國家手裏，便會亂國亡國。如落在私人手裏，便為植黨營私的工具；在地方手中，則為培養地域主義的工具；在教會手中，是製造教民的工具；在外人手中，是殖民主義的工具。清末以來的教育，已發生主權旁落的現象，應重新集中于國家手中，以統一國民意識，創造國家文化與鞏固國家基礎。

(4)教育是一種國家制度，必須如此，教育才能成為國家的工具，完成國家的功能與目標。^⑬

國家主義教育思想已發生下列影響：(一)從教會及外國人手中收回教育主權。^⑭(二)擴大軍事教育運動。(三)學校加授愛國教材。(四)促使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年會中決議以國家主義為教育宗旨。(五)喚起教育界的愛國運動。^⑮

7.教育獨立思想：與國家主義教育思想不同，教育獨立思想主張教育權應歸教育家，而非歸國家、黨派與教會。這種思想接近烏托邦，不可能實現，但也有它產生的政治社會背景，在民國教育史上曾經曇花一現。它的主要倡導人是在民國教育界扮演重要角色的蔡元培。他是自由主義者，學術自由與教育獨立可以說是他的奮鬥目標。民國元年，他於「新教育意見」一文中已隱含這種思想。他說：

「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專制時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當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⑯

以蔡氏所討論的教育宗旨而言，軍國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為隸屬於政治之教育，因為民國所必須。而世界觀及美育主義，則為超軼政治之教育。^⑰此處之所謂超軼政治，指比類學科之性質與內容而言。但上述引文之所謂超軼政治之教育，則指教育家有權訂定教育標準，不受政治干涉而言。教育既為國家或政府實現目標之重要工具，它就不能超軼於政治之上。然而蔡氏之此項主張，竟引起廣泛的共鳴，乃當時之政治社會環有以致之。民初的政治不安，及他本人在北京大學的

^⑬ 同上書，頁二一一～二一三。

^⑭ 楊翠華，非宗教教育與收回教育權運動，1922-193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六七年，打字本）

^⑮ 陳啓天，同前引書，頁二一五。

^⑯ 教育雜誌，卷三，期十一（民國元年二月十日），「言論」，總頁三三六四～三三七三，蔡元培，「新教育意見」。

^⑰ 同上，總頁三三七〇。

經驗，使他鄙視政治。他一向堅信教育為救國之唯一法門，於是有「教育獨立」之議。先是，五四運動以後，北洋政府與教育界之對立尖銳化，教育經費僅占國家預算的七十五分之一，而積欠累年，教師生活尚且困難，何圖發展。因之，民國九年（1920）全國教育聯合會有「教育經費獨立」之決議。十一年（1922）初，教育雜誌進而鼓吹教育立法與教育行政之獨立。蔡元培遂於是年三月發表「教育獨立議」一文，主張教育脫離政黨與教會而獨立。他說：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⑮

何以必須脫離政黨？因政黨製造一種特別的羣性，與個性相反；政黨只求近功，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當政不常，因更迭而改變教育方針，難受實效，所以教育必須超然於政黨之外。教育又為何須超然於各派教會之上？因教育是進步的，學術後勝於前；而教會是保守的，不許懷疑與批評；教育是共通的，沒有界限；教會是差別的。因此，教育必須獨立於教會之外。

如何實行超然的教育？蔡氏提出下列辦法：

(1)分全國為若干大學區，每區設立一大學，凡中等以上各種專門學術，都可設在大學裏。區內中小學教育與社會教育均由大學辦理。是大學兼管區內教育行政，不須政府管理。

(2)大學的事務，由大學教授所組織之教育委員會主持。

(3)大學校長，由委員會推舉。

(4)由各大學校長，組織高等教育會議，辦理各大學區間互相關係之事務。

(5)教育部之職權，限於辦理高等教育會議所議決事務之有關於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國教育統計與報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學區之事務。

(6)教育總長必須經高等教育會議承認，不受政黨內閣更迭的影響。

(7)大學不設神科，各學校不得傳教，教士不得參與教育。

(8)各區教育經費，從本區中抽稅充用。^⑯

這是蔡氏綜合、法、德、英、美等各國制度之所長所擬就的辦法，雖獲李石曾

^⑮ 蔡元培先生遺文類鈔，頁一〇〇。

^⑯ 同上書，頁一〇〇～一〇二。

的支持，惟因中國南北分裂，北方軍閥對他的教育改革計劃缺乏興趣，沒有實現。民國十六年（1927），因得南京政府支持而付諸實施。這便是所謂「大學院制」。^⑳然而這種制度之可行性是可疑的。因完全出於蔡氏個人的主觀願望，並未根據中國社會之當前客觀情勢與實際需要。蔡氏雖想透過教育會議取得教育政策之決定權，但與當時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思想相衝突，結果失敗，大學院廢止。教育獨立的理想終未能實現。僅剩下中央研究院一個據點，貫徹他學術研究的主張。^㉑

民國初年的教育思想，除了上述七種以外，還有美感教育、大同教育、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等主張，或缺少系統理論，或廣泛而無實際，或為上述主要思想之交流，而未構成影響。

上述七種主要教育思想，雖發生時間及其強勢有所差異，都是同時並存的。實利主義與科學教育思想相輔相成。國家主義教育為軍國民教育之擴大，而與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相衝突，與教育獨立於政府之外的主張，雖同以政黨與教會為敵手，然於教育權之控制，仍互相衝突。國家主義與教育獨立之主張，均於北伐統一以後消失。在這七種思想中，能超越時空與政治變遷的，為實利主義與科學教育二種，雖然在民國初年，因客觀條件限制，尚未能深入普遍立下鞏固基礎。民主主義教育思想分向二個方向發展。自由主義派強調個人特質與潛能之發揮，是屬於正規教育與社會上層的教育。人道主義派則付出更大同情心，走向社會下層與廣大農村，將教育的果實普及於「平民」。前者以「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為指標，後者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為行動的準則。實則並不衝突，而是相輔相成的。

民國成立以後的教育思想，比起清末來，多采多姿，豐富而深入，真所謂「百家爭鳴」。其原因很多，主要者：（一）政治體制由專制改為民主，言論自由。（二）軍閥爭權奪利，不太關心文化思想問題。（三）清末民初留學歐美的學生陸續返國，在文化思想上逐漸取代留日學生的優勢，如蔡元培（留德）、胡適（留美）、蔣夢麟（留美）任鴻雋（留美）、陶知行（留美）、晏陽初（留美）等，均發生很大的影響。雖然在教育部任職者，仍以留日學生為多。（四）國際教育家之交流訪問增多，刺激教育界之思想，由政府派赴歐美各國考察教育者，帶回許多新的觀念。而應邀來華訪問的教育家，諸如英國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美國的瑟婁（T. H. P. Sailer）、杜威（John Dewey）、孟祿（Paul Monroe）、推士（George R. Twiss）、克柏屈

^⑳ 陶英惠，「蔡元培與大學院」，在近史所集刊，期三，上（民六一年七月），頁一八九～二〇〇。

^㉑ 同上書，頁二〇四～五。

(William Kilpatrick)、麥可 (William McCall)。美國學者羣中，除了推士來自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外，餘均來自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的師範學院(Teachers College)。可以說民國以後的中國教育思想，深受哥大的影響。傅斯年於民國二十一年對哥大師院學生的批評，^⑫存有成見，不太公平。

從區域的觀點而言，江蘇省的教育界比各省有活力，對新教育觀念的試驗、接受與散佈工作均有顯著的貢獻。黃炎培（江蘇省教育司長）發揮了卓越的領導能力。這是近代教育史上不應該磨滅的。

綜覽自同治以來六十餘年間的教育思想，清末與民初有顯著的不同。前期集中討論應否接受西學及接受那些西學的問題，得了一個「中體西用」的結論。民國以後，教育思想的瓶頸消除，而向教育哲學、教育目標、教育制度與對象等方面發展。受歐美，尤其是美國的影響加急，然多能根據本國的社會需要，諸如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科學教育、教育獨立等。在教育對象方面，由過去的特殊階級教育，進而為平等的國民教育與平民教育。女子不再被拒於學校門牆之外。教育的實用主義傾向愈來愈深，具有教育現代化的意義。

^⑫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民六九），冊六，頁八～九。